

论中苏论战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影响

孙忠良 陈德祥

(吉首大学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更大。中苏论战加剧了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探讨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影响,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D27.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2)01-0021-04

苏联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与苏联两国结成了同盟关系。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使中苏关系开始走向复杂曲折。1956年4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做出了肯定,但是不同意苏共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中苏两党在对于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也成为后来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随后发生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问题,使中苏之间的“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并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两党的分歧与矛盾。1963年,中苏双方围绕着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展开了论战。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

名义,连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共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了3000多篇反华文章,并指使80多个共产党对中共进行围攻。至此,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是无可挽回。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中央曾积极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但是苏共新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仍然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中苏两党关系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善。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这篇文章表示,“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它一万年”。^[1]苏共不甘示弱,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抨击中共,两国两党关系日益恶化。1966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两党关系中断了23年之久。中苏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更大。

收稿日期:2011-09-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关系研究”(10BKS06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忠良(1980-),满族,辽宁丹东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陈德祥(1975-),土家族,湖南桑植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

一、中苏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人民广泛地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寻求一种被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就必须用中国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奥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 [P534]}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过程”,^{[3] [P149]}就是在承认和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及主体人格的基础上,培养民众成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实践主体的过程。通过中苏论战,中国共产党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并在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也在具体的行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采用民族的语言、民族的形式,以通俗的内容、形象的表述对马克思主义开展广泛的普及宣传。

毛泽东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马克思主义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动员千百万人民来参与。这就要求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理论交给群众,让群众掌握理论,使之成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毛泽东还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4] [P320]}

当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当时的现实国情,向党员干部和各界民众宣传、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还不能完全适应刚刚建立起来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状况。经过中苏论战,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毛泽东曾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主流和支流”论述有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论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认同。

二、中苏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使其被群众所掌握和接受并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理解。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能动的物质力量。任何正确的理论,必须说服群众、掌握群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为人民所接受,由人民群众创造和发展。否则,再好的理论,只要离开人民群众,脱离群众,都是一事无成。理论的巨大成就,来源于其必须走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实际运动相结合。毛泽东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5] [P116]}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让群众看得懂、用得上。要运用通俗易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理论从理论家的书本上、从思想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真正掌握群众,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源泉和基础,人民群众是理论的真正创造者和实践者。

但是,中苏论战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出现失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遭受挫折,出现了教条化、绝对化和庸俗化倾向。

第一,中苏论战助长了执政党的强制干预,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科学的批判精神

中苏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开始逐渐步入了强制干预的极端。

执政党甚至直接介入或干预学术争论,致使自由正常的学术争论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和1965年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用简单甚至粗暴的方式强制干预理论与宣传活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严重扼杀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传播的畸形的社会氛围。在“文革”期间,林彪和“四人帮”集团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从一己之私出发,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科学性,甚至沦为了政治的附庸。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活水源头和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要求不应由国家政权机构或党的领导人来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在于其科学性,一旦失去了科学的批判精神而变成政治的附庸,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现实的生命力。

第二,中苏论战助长了对于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主观化的危机

对于个人崇拜现象,我们必须历史、辩证地对待。从其产生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来看,这一崇拜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赖和崇敬,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信仰热情,有利于维护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危害。当领袖人物垄断了理论的解释概括权而成为惟一的最高权威,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可能就无法独立思考而盲目地追随领袖人物的个人思想。对领袖人物和经典作家的引证代替了理性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一旦形成这样的机制,一个社会就会变成思想停滞、观念僵化的社会。

中苏论战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不断提高,由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日益严重,苏共对于中共及其领导人也进行了公开的批评,赫鲁晓夫称中共是“疯子”、“假革命”、“比南斯拉夫还坏”。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共主要领导人马利诺夫斯基甚至还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毛泽东,并公然煽动“把毛泽东搞下台”。出于维护领袖权威的需要,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倾向开始滋长,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等人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

对毛泽东本人进行吹捧。1965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时,承认了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大肆宣传个人崇拜,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还奉为“最高指示”。认为凡是有悖于毛泽东的言论和行动,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要坚决打倒。对于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化。

第三,中苏论战助长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而导致了实践的严重失误

中苏论战期间,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路线。而苏共也批判中共是“左倾冒险主义”,并扣上了“反列宁主义”的帽子。双方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模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中共开始坚持与固守传统的模式,防止“修正主义”的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陷入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被曲解,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无法正确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严重失误。

由于中苏两党在论战过程中处于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陷入与苏共“对着干”的思维定势,采取了一些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过激的“左”的做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度和“左”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1958年,在经济上实行的“大跃进”,在文化上也相伴随出现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后来又出现了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采取“革命大批判”、“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方法,发动“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的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一度被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操控和利用,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

究逐渐演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推崇和对毛主席语录的机械背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被整得面目全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行其道,“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群众运动成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庸俗化为空洞的教条,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脱节,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非但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反倒将其推向简单、死板和庸俗的窘境。“文革”后期虽然提出了开门办学、创建农民学习班、办好政治夜校、发挥电影和样板戏的作用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方法,但是,路线、方针和思想内容的错误,决定了再好的形式和方法,也不可能起到积极正面的

作用。

中苏论战使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留下了历史的问题和遗憾。

参考文献:

- [1]罗平汉,袁本文.中苏论战始末(下)[J].时代文学,2008,(3).
- [2]毛泽东文集(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Z].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
- [4]毛泽东文集(卷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毛泽东文集(卷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孙书平)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Sino – Soviet Debate on China’s Marxist History

Sun Zhongliang , Chen Dexiang

(University of Jishou , Jishou , 416000)

Abstract The Sino – Soviet debate that occurred in the 1960 of the 20th century brings a profound impact on process of the popular histor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This effect has both positive side and negative side; On the whole ,its negative impact is greater. Sino – Soviet debate exacerb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ft" deviation errors and dogmatism , which led to a large mistake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opularity of Marxism. Discussion on the Sino – Soviet deba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rxist to promote the popularity of Marxism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Sino – Soviet debate; popularity of Marxism; historical influence